

语 文 进 修

YUWEN JINXIU

(三)

宁波地区教师进修学院函授部编

目 录

谈《阿Q正传》	戴莲康	1
开创一代诗风的《女神》	凌 坚	16
朱自清的《背影》和《荷塘月色》	应平亚	27
美学的对象浅谈	杨成寅	34
文学的回声	夏 真	61
文艺理论学习与《论凤姐》	周乃复	46
谈文学的阶级性与人性	肖 涵	52
也谈修改文章	化 予	65
词的正训反训和词的褒义贬义	桂心仪	71
中学文言文评注“黔之驴”	梅 溪	77
《捕蛇者说》教学实录	(转载)	82

读《阿Q正传》

戴莲康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杰出的一篇，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作品之一。这部作品的产生过程是这样的，最初是鲁迅的学生、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来向他约稿，要他在新开辟的“开心话”栏内写点东西，鲁迅本来对阿Q这一影象有了好几年，就开始写了一章，开头登在“开心话”栏内，为了切合“开心话”这个题，就加上一些幽默和滑稽，也不署鲁迅的笔名，而另外用了“巴人”的名字，就是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但是鲁迅这部作品的主题是非常严肃的，愈写愈认真起来了，开心话既不开心，也不轻松，所以从第二章起，就搬到“新文艺栏”里，从1921年12月登起，到1922年2月登完，后来收在鲁迅《呐喊》这部小说集里。

《阿Q正传》是一部不长的中篇，但它反映的社会历史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是极其惊人的。作者通过南方一个小小的农村——未庄，通过这个南方农村人们的活动，展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整个社会阴暗的面影。正如1952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的，“它是旧中国劳动人民奴隶生活的深刻写照，也是中国近代民族被压迫历史的缩影。”

鲁迅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揭露国民性，也就是国民的劣根性，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①那时候鲁迅正在研究中国的国民性，其实就是民族性，特别注意它坏的一面，因为研究的目的在于改造，当然是

注意坏的方面了。那时候鲁迅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还不能用阶级观点来观察国民性问题，还不能把封建统治阶级没落腐朽的意识形态与它对劳动人民施加的恶劣影响区别开来，所以提得比较笼统。

书中的主人公阿Q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个最杰出的艺术典型，可以称得起典型的，阿Q是一个。他与世界文学宝库中一些杰出典型相媲美，确实毫无愧色。

阿Q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看法很不一致。最初有人提出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也有人曾认为阿Q“主要的是一个思想性的典型，是阿Q主义或阿Q精神的寄植者”，还有人认为阿Q是个没落人物的典型，后来多数人认为阿Q是一个落后农民的典型，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就讲到阿Q是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但也有不同看法，如茅盾认为阿Q是一个普通农民、一般农民的典型，周建人认为阿Q不象农民，而似乎是一个城市杂工的典型。我认为，阿Q是辛亥革命前后一个一无所有的农村无产者，原先在未庄做着“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的打短工生活，后来由于农村经济的凋敝和破产，没有人雇用他了，只好被迫流落城乡，又变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流浪汉。所以总的来说，阿Q勤劳、朴质，是农村下层社会的一个劳动人民，而且是赤贫，但他又区别于传统的农民，这只要把阿Q与《故乡》中的闰土、《社戏》里的农民一加比较，就可以看出，阿Q的性格与传统农民的忠厚纯朴性格有明显的不同。这里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鸦片战争以来，资本——帝国主义的魔爪愈来愈向中国深入，从都市到农村愈加殖民地化了，半殖民地都市里小市民的市侩哲学日益侵蚀到宗法统治的传统农村，由于阿Q所处的乡镇和临时杂工的社会地位，经常同游民阶层接触，甚至后

来成为其中的一员，就很容易接受这种思想影响。阿Q的性格已不纯粹是封建社会传统农民的纯朴性格，而掺杂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小市民处世哲学的影响，这就是阿Q的性格趋向复杂化的根源。

阿Q生活在偏僻闭塞的南方小农村未庄，这个未庄是以赵太爷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统治的天下，是当时旧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阿Q在这村庄里，沾染不少坏习气，嗜酒、好赌、好吹牛，但又有农民式的质朴、赣直、肯出力气干活，虽愚蠢又带几分狡猾，从不肯示弱，有一种盲目的自尊自大的心理。在他生活中，贯穿着盲目的自尊自大的心理与卑微低下的社会地位的矛盾，低下的社会地位并没有赋予他自尊自大的权利。他常和人家吵的时候，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有一回，他把自己列为赵太爷的本家，说是比秀才还长三辈，赵太爷为了本家的事，把他找去，训斥了一顿，给了他一个嘴巴，还让阿Q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阿Q很爱体面，可是偏偏在他头皮上长了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这对于阿Q来说，真是非常难堪的事情，于是他忌讳说“癞”、“光”、“亮”等字眼，后来连“灯”、“烛”都忌讳了。他愈要忌讳，别人就愈要捉弄他，偏要“挖”他的癞疮疤，这样，就惹起了许多口角和打架，但是，结果总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阿Q不敢正视自己的屈辱地位，不敢触及自己的弱点，多次的教训使他改变了办法，他开始沿着抵抗最小的路线去对付口角和打架，他估量着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后来吃亏的还是他。他于是再变动方针，改为怒目而视，但是怒目主义还不行，未庄的闲人们仍然要撩他，惹他，他在精神上仍然压得喘不过气来，他又想出了办法，用种种譬解来安慰自己，你嘲笑我头上的癞疮疤，我就说你还不配，仿佛在阿Q头

上的是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又比如：他被人家揪住辫子，在墙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阿Q就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他得胜了，心满意足了。他用这种自欺的虚假理由来取得心理上的某种平衡，以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脱，使自己不知道什么叫微屈辱，什么叫做痛苦，可以混混噩噩地活下去。这些自欺欺人的想法，就是众所熟知的精神胜利法。

尽管阿Q百般譬解，但仍有不少难堪的事情使他无法譬解，特别是他最看不起的王胡和他最厌恶的假洋鬼子都打了他一顿，使他受到了生平的二件屈辱，他感到无所适从，然而“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却对他发生了效力。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在阿Q头上拍拍的响了不久之后，他已经忘个干净，并且早已有些高兴了；又比如，他在吴妈那里求爱惹事出来以后，不久，反而跟着旁人去打听凑热闹，直到赵秀才拿着一支大竹杠向他奔来，他才记起原来吴妈的哭闹与自己有关。

然而，“忘却”这一法宝有时也不见得灵验，吃亏的常常还是他。他摆脱不了，就把怨愤发泄到比他更弱的人身上，拣软的捏，拣弱的欺。他调戏小尼姑，深以沾得便宜而自喜，他主动找又瘦又乏的小D打架，结果弄了个平手。在他思想上，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似乎是理所当然。

阿Q是个临时雇工，又没有一点文化，但是封建传统思想在他脑子里却是非常之深。比如，他对“男女大防”历来非常严，看见一个女人在外面走，或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他会在冷僻处，从后面掷一块小石头；又比如，他听从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看见杀革命党，还说是好看好看；再比如，看见官老爷坐堂，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

下去了。但是封建传统思想与阿Q所处被压迫阶级地位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他顺从着封建社会的法规去做，但是阿Q这一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的一切正当要求，封建社会却没有给过他一份。因此，他从阶级本能的要求出发，就不能不常常触犯以至冲破封建社会的法规，当他要求女人的时候，他敢于向吴妈脚下求爱，饥饿的时候，敢于翻过静修庵的墙偷萝卜，他丧失生存之路的时候，敢于进城干偷窃的勾当，感到革命和革命党对他有利的时候，他一反“一向深恶而痛绝之”的常态，也要革这伙妈妈的命，也要投降革命党了。这当然还只是阿Q式的革命，但究竟触犯过那个封建社会的秩序，使赵太爷之流感到“气忿”而且担心，也使未庄的人们“惊惧”而且“恍然”。从阿Q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受到封建传统思想影响的同时，也存在着反对传统守旧势力潜在的强烈要求。当他恋爱失败，没人雇短工，生计成问题，幻想破灭了，他不能不面对现实的生存问题，那时什么精神胜利法，什么封建传统思想都只能一股脑儿置之脑后，他必然要挺而走险，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阿Q对现状的不满，贯穿着他整个的一生，也确有一种乐天派的精神支持着他，使他在极端困难下能活下去。他不屈服于命运，一直到最终也没有完全屈服，我们可以看到，一旦社会变动、封建统治发生动摇时，阿Q的反抗性便很快地显露出来。

在鲁迅的笔下，阿Q是个被夸张了的人物。作者用放大镜突出地描写了他奇怪的思想方法，——这就是前面所讲的、作者以“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两章篇幅集中描写的精神胜利法，而把他的受压迫要反抗的一面以及其他性格（如老实可欺等等，鲁迅没有正面写出来。）放到了次要的地位。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一种消极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的存在，一方面由于客观的敌对势力过于强大，又一

方面新兴的革命力量还没有进入到这古老的农村，新的革命思想也不可能从小生产者中间自发产生。由于被奴役的社会下层在物质上精神上被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得无以复加，由于不断地反抗而遭到不断地失败，为了不甘屈服而事实上又无力反抗，他们必须寻求排遣精神上的淤积，否则就会无法生活下去，结果阿Q找到的一条路，就是使人异常痛心的精神胜利法。这种既可悲又可恨的精神病态，是残酷的现实生活迫使成的，在形式上看来可笑，骨子里却是可悲。它虽然在精神上对敌人是一种敌视，但无损统治阶级的一根毫毛，它对自己虽然是一种自我安慰，但也无补于自己的悲惨命运。它是一支自我残害、自我麻醉的消蚀剂，对劳动人民革命意志起着严重的腐蚀作用。

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性格悲剧，是阿Q所处的“旧的不能照样下去，而新的还没有到来”的时代悲剧。他的性格贯穿着他的最悲惨最无依靠的阶级地位和他受到封建传统思想严重侵袭而不能觉悟的矛盾，因此，他在思想上，向往改变境遇而又因袭守旧，对现状不满而又心安理得，自高自大而又自暴自弃，想女人而又封建，在脾性上，淳朴而带有流气，愚蠢而带有狡猾，在遭遇上，几番得意饱含着痛苦，几番胜利带来的失败，最后他要投革命党却为“革命党”所杀。所有这些，都是阿Q性格上这一根本矛盾在各方面的具体体现。

但是，作为精神胜利法来说，并不是阿Q所属劳动人民的阶级本性所固有的，而是封建统治阶级没落时期腐朽的意识形态。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阿Q接受统治阶级思想影响的结果。封建老大的前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屡受资本——帝国主义欺侮凌辱，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经常处于无力还手的挨打地位，然而前清王朝以及后来的反动统治当局仍是昏聩无能，保守自大，不思改革，反而打肿脸孔装胖子，

吹嘘自己的精神文明冠于全球；不仅如此，反动统治阶级还把外来的强大压迫和屈辱转嫁到被统治的各阶级各阶层身上，并用种种骗和瞒的办法蒙蔽他们，麻痹他们的革命意志，以维护自己的统治。由于难于抵御的外来压迫和国内统治阶级的恣意宣传，使近代中华民族蒙上屈辱压抑、难以自拔的精神阴影，患了一种时代的心灵病态。这种时代的精神病症在当时象瘟疫一样在社会上到处流行，它成为民族进步、反抗外来侵略的一个严重障碍。这使启蒙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长期以来感到严重焦虑。

在当时的鲁迅看来，光是推翻反动统治、打倒旧的社会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对整个民族的国民性加以改造，而改造的基本问题是唤起整个民族包括最大多数的底层劳苦者在内的觉悟。只有抛弃“精神胜利法”以及与此相连的封建、愚昧、麻木、欺弱怕强等等的落后性，站起来斗争，他们才能得救。最大多数的底层劳苦者，是当时统治者转嫁生存危机的主要对象，在他们身上，承担了全民族所受的痛苦和压迫。因此，鲁迅就着力表现阿Q这一社会底层人物，突出地抓住他的精神胜利法，给予了毫不留情的解剖和批判。鲁迅这种怒其不争的心情正出于他的革命人道主义者的战斗要求，出于他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鲁迅在《阿Q正传》里就是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要末唾弃这个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要末就是“大团圆”死路一条。《阿Q正传》提出这一深刻的启蒙主义思想，犹如暮鼓晨钟，发人深省。

阿Q的精神胜利法虽然来自统治阶级的影响，但应当指出，当精神胜利法被被压迫阶级接受以后，则是以自己的社会方式和阶级特性表现出来，同统治阶级的精神胜利法具有本质的区别。阿Q的精神胜利法表明，统治阶级不仅在物质上对劳

动人民进行无情的剥取，而且在精神上也给予了严酷的摧残，使他丧失了一个做人的起码地位。阿Q处于小生产者的脆弱地位，又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无力挣脱种种苦难屈辱，只好无可奈何以此作为自我安慰，自我解脱，貌似欺人，实为自欺；这是一种暂时的社会现象。而统治阶级的精神胜利法则是一种封建的淫威，象赵太爷不准阿Q姓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貌似自欺，实为欺人，其目的就是实行愚民政策，维护其封建统治。在这里，我们必须以明确的阶级观点来看待统治阶级的“精神胜利法”和劳动人民身上的这种思想影响，把这两者区别开来。当时鲁迅还是一个启蒙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他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广大劳动人民的觉醒上，但对当时劳动人民中间潜在的积极的斗争力量，还缺乏充分的认识和有力的描绘；至于依靠什么样的力量，才能领导劳动人民从封建统治下解放出来，用什么方法，才能克服劳动人民精神上的弱点，这些，都还是作者当时正在努力探索的问题，作品没有充分表现。

鲁迅在《阿Q正传》中还对辛亥革命作了彻底的批判，落后的未庄，冷漠、阴暗，传统的因袭观念重重地压在它身上，犹如一沟停滞的腐臭死水，一切都服从旧社会秩序的安排，没有一点贰逆之音。辛亥革命一度曾投进了一块小石，掀起了一圈圈的波纹，举人老爷的船下了乡，阿Q是这水波卷起的浪花，起来要闹革命，统治者着了慌，破天荒地把阿Q的名字改称作“老Q”、“阿Q哥”，这充分表明统治阶级惊慌失措，已经处在摇摇欲坠的地步了，只要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一发动群众，就可以把封建势力打倒。但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却与封建势力同流合污，在未庄，假洋鬼子与赵秀才和了好，除了把辫子盘在顶上，跑到静修庵草了“皇帝万岁万万岁”

的龙牌，给老尼姑不少棍子和栗凿，此外就没有什么异样。辛亥革命失败后，未庄依然是一沟死水，作为这个水波浪花的阿Q做了革命失败的陪葬品，沉下去了。最后，鲁迅用阿Q的尸体强烈地控诉了资产阶级对革命的背叛行为，对辛亥革命的失败作了历史的裁判，指出了它失败的原因——没有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

《阿Q正传》不只在思想上，而且在艺术上也登在现代文学发展的高峰上，它是中国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杰作。作品反映的生活面包括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这整整一个历史时代，这样广阔、深刻的社会内容，许多长篇小说都是很难企及的，但鲁迅仅只用了中篇小说的篇幅。这是与作者的巨大艺术手腕和使用文学语言的能力分不开的。

《阿Q正传》的现实主义方面所显示的成就就在于，它对社会作了真实而深刻的反映和揭露，同时又成为感召千百万人民振奋起来实行改造自己环境的锐利武器。

《阿Q正传》在艺术上首先体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光辉的现实主义原则。阿Q这一人物是为未庄这一周围环境所决定，是与赵太爷、赵秀才、假洋鬼子、地保、王胡、小D、吴妈以及酒店里的闲人们不断接触交涉中孕育、形成、发展而变化的。未庄的人们没有是非心，同情心，抱的实利哲学，除了赵太爷们的霸道淫威外，大多具有小市民的顺民性格，他们惯于顺着统治阶级的思路去思索，他们都说阿Q坏，为什么呢，被枪毙便是他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阿Q被赵太爷打了以后，知道的人都说阿Q太荒唐，自己去招打，为什么呢？“他大约未必姓赵，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在这样的环境里，阿Q既受到他们的压迫和欺侮，又接受他们市侩哲学的不良影响，这样，这一典型人物

的形成便找到了合理的社会根据。而未庄这一具体社会又是帝国主义长驱直入、农村经济凋敝没落、封建上层建筑腐朽不堪的旧中国广大农村的一个写照，与当时分散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落后的农村自然经济和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作者从细节描写上也遵循着现实主义的真实原则，如城里已经动手剪了辫子，未庄却只是把辫子盘在头顶上，从这些微的差异点说明了未庄比城里还落后、保守，也真实地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广大农村没有什么大变动的实际情况。

作者在塑造《阿Q正传》人物性格的个性化上也达到了极致。在作品十多个人物中，那怕是一笔带过的，其性格都栩栩如生，跃然欲出。拿着墨不多的邹七嫂为例，她是赵太爷的邻居，受赵家之托，去寻阿Q买东西。她硬把阿Q找来，一走进赵府就气喘吁吁地说：“他只说没有没有，我说你自己当面说去，他还要说，我说……”从她急迫的断续的语言中，一方面尽力为自己辩白，一方面又设法讨得赵家的欢心，这是多么符合邹七嫂这个旧式妇女的势利讨好的性格呀！

在“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两章里，作者很多地方从心理分析着手，探索了阿Q性格的各个方面，并用夹叙夹议的方法，突出了精神胜利法这个核心，给人们以非常深刻的印象。也有采取从旁反衬和景物烘托的方法来呈现心理状态的，如阿Q爬进静修庵的矮墙，只见里面真是郁郁葱葱，但似乎并没有黄酒馒头，以及此外可吃之类，靠西墙是竹丛，下面许多笋，只可惜都是并未煮熟的，在饿极了的阿Q眼里，美的感觉没有了，他要的只是填饱肚皮的东西。也有从行动来展示人物性格的，阿Q有一次从城里偷东西回来，与以前回到未庄来不同，“阿Q前几回的上城，大概早就兴高彩烈的对人说，但这

一次却并不，所以也没有一个人留心到。”从这里可以看到阿Q做贼心虚的一面，但从阿Q的性格来讲，他有钱就要摆阔，从不肯隐晦的，于是他带挂着一个显眼的装满钱的沉甸甸的大搭连到酒店来了；这一方面又生动地表现了阿Q爱出风头的性格。也有从事件中来表现人物性格的，象赵府晚上点灯有规矩，有的不准点灯，有的准其点灯，但点与不点之间，恰好表现了赵太爷贪婪、吝啬的剥削阶级性格。又如赵府一家在买阿Q的便宜货事件上，各人都表现了自己的性格特点，赵太爷的奸滑，赵秀才的冒失，秀才娘子的妖媚，赵太太的贪小，从各个角度揭示出剥削阶级的贪得无厌的本质。作者还从对话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在地保教训阿Q一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头蛇的势利形象：“阿Q，你的妈妈的！你连赵家的用人都调戏起来，简直是造反。害得我晚上没有觉睡，你的妈妈的！……”在地保的心目中，有钱有势人家的用人也与平常人家不同，用造反这个威胁性的字眼，很能反映官家人的身份，“害得我晚上没有觉睡”又为下文“应该送地保加倍酒钱四百文”伏下敲诈的线索，甚至“你的妈妈的”，看来可笑，恰好是这班人欺侮弱者的口头禅。一连起来，一个官家的走狗形象就活龙活显了。作者还善于借绘画的方法来描绘人物的形象和性格。阿Q和小D的“龙虎斗”，便是运用了这一方法。

小D一手护住了自己的辫根，一手也来拔阿Q的辫子，阿Q便也将空着的一只手护住了自己的辫根。从先前的阿Q看来，小D本来是不足齿数的，但他近来挨了饿，又瘦又乏已经不下于小D，所以便成了势均力敌的现象，四只手拔着两颗头，都弯了腰，在钱家粉墙上映出一个蓝色的虹形，至于半点钟之久了。

作者在这幅画里痛心地嘲讽了阶级兄弟之间的严重隔膜，描绘了他们互不相能而致搏斗的情景，而结果是：

阿Q的手放松了，在同一瞬间，小D的手也正放松了，同时直起，同时退开，都挤出人丛去。

“记着罢，妈妈的……”阿Q回过头去说。

“妈妈的，记着罢……”小D也回过头来说。

语言一颠倒，正好说明他们势均力敌，谁也不能胜过谁，谁都是一个弱者，在盲目的和生活搏斗。

《阿Q正传》特别突出的显示了鲁迅写作上由于讽刺幽默而产生的这种冷隽而又热辣的风格。

这种冷隽而又热辣的风格是出于作者的革命启蒙和战斗要求。整个作品从头到尾都充满着针砭的刺，作品里没有一个正面肯定的人物，但这正是作者期望着战斗的新人的诞生。同样是讽刺，他对人民和敌人态度是有区别的。在对社会下层病态的严厉批判中，鲁迅是饱含着眼泪的，他冷中有热，刺中有痛，憎中有爱，他期望广大劳苦群众唾弃这种病态的性格。鲁迅几处写到阿Q：他睡着了。在这含意深长的话里，表明阿Q这时已心情释然，无所牵挂，但又流露了作者对他的痛心和惋惜：你怎么又睡着了！但当笔锋转向敌人时，他的讽刺就立即喷射出极度憎恶的火焰，象硫磺一样烧向敌人。其实，就是鲁迅在针砭劳动人民的病态时，也常常把锋芒直指敌人，给敌人以毫无保留的打击。如鲁迅讽刺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是在揭露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精神文明，作者的阿Q排斥异端之说实质上也是攻击道学先生的。作者对长衫人物虐杀了阿Q，却骂阿Q下跪是奴隶性，正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的

讽刺和嘲笑，而对统治阶级的讽刺是彻底否定的，是致命的。

在《阿Q正传》里，讽刺常常与漫画式的夸张相联系的。常常几笔勾勒，一幅漫画似的人物形象就呈现在面前了。阿Q就是一个被夸张了的人物，夸张到捉虱子比不过王胡，都感到太失体统，连自己是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连打自己两个嘴巴，都感到是一种得胜，有些描写，乍看起来，在现实生活中似乎站不住脚，但是它却符合艺术真实的。因为它更能突出阿Q精神胜利法的本质，显示出这种精神状态的荒诞可笑。

鲁迅笔下的讽刺常带有一种引起人们会心微笑的幽默感。这与他的含蓄的反笔很有关系。如书一开头要为阿Q做传，举了好多传的名目，却最后从“闲话休题，言归正传”中取出“正传”来。看来好象挺风趣，挺幽默，其实都是反笔，深深地讽刺了当时封建社会里为大人物巧立许多作传名目的庸人俗子，显示出作者立志要为一个普通小人物做传的平民本色。作者在阿Q的姓名上曾经做了不少文章，甚至来过一番风趣的考证，但它恰是说明了一个下层劳动者在旧社会的悲惨命运，也针刺了赵太爷剥夺弱者冠姓权利的淫威，并顺手拿胡适派的考据作了一番使人难以还手的揶揄。

在结构上，《阿Q正传》也是最完整，最别致的。看起来，作者继承了中国传记小说的形式和结构，人物性格交代明确，情节发展清清楚楚，有头有尾。作品开头是序，接着两章集中介绍人物身世、性格，很快就展开了矛盾，矛盾的最终解决——大团圆。其实，作者却一反其道而行之，他尖锐地嘲笑了为大人物作传的名目和“某，字某，某地人也”的通例。他不是为做传的人说尽好话，而是处处给做传的人出“丑”，最后的结局却是最不团圆的“大团圆”。在全局安排上，前后左右都是互相照应的，前面写了考据，后面也有照应的回响，如“还

有赵白眼的母亲——一说赵司晨的母亲，待考，”又如阿Q在赵家舂米时的那破布衫，开头吴妈说“我们的少奶奶是八月里要生孩子了”已为破布衫的下场伏下了因子，接着阿Q“春了一会，他热起来了，又歇了手脱衣服”，便把衣服搁在赵府了。在夜里，“阿Q坐了一会，皮肤有些起粟，他觉得冷了”，便想到那件破布衫，到那时“阿Q不准再去索取工钱和布衫。”

“那破布衫是大半做了少奶奶八月间生下来的孩子的衬尿布，那小半破烂的便都做了吴妈的鞋底。”这破布衫的前因后果安排得多周密，而破布衫的下场也恰好反映了劳动人民悲惨的命运。仅仅一次恋爱就被闹得把他仅有财产——可怜的布衫、毡帽、棉被全部给了人家。

《阿Q正传》的语言简短、精炼、准确、生动。比如写两种静景：“庵和春天时节一样静，白的墙壁和漆黑的门。”仅仅十来个字，多么具体地唤起人们安宁静谧的感觉。但在另一种场合：“这一夜没有月，未庄在黑暗里很寂静，寂静到象羲皇时候一般太平。”这里的静景却潜伏着严重的不安和恐惧。又如“村外多是水田，满眼是新秧的嫩绿，夹着几个圆形的活动的黑点，便是耕田的农夫。”寥寥几笔，便描绘出一幅农家春色的图画。作品里写景的地方不多，但就其文字精细淬炼来讲，的确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用词上，鲁迅能够运用自如，富有独创的新颖特色，阿Q调戏小尼姑时，他写了阿Q十分得意的笑和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在差一分的笑里，我们清楚地看到酒店里的人市侩式的卑微精神状态。类似深闺与浅闺，阿Q与老Q，都是很有别致的用字，既风趣生动，又富有思想内容。作品中也用了文言，但这正是杀回马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目的是嘲弄封建文人，而且也增加了文章的幽默感和生动性。

《阿Q正传》发表以后，立刻在广大读者中间引起极大的反响。

茅盾在1923年的《读呐喊》中说：“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阿Q’这两个字。我们几乎到处应用这两个字。”不仅从效果来看，它具有极为广泛的社会意义。而且鲁迅也正是从广阔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中去概括阿Q的形象的。他在写作上也正如自己所说的：“我的方法是往往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既疑心到象是写自己，又象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②为了做到这一点，作者在《阿Q正传》里，都不给所有人物具上真名字，只是阿Q、小D、王胡、赵太爷、假洋鬼子、吴妈等等，甚至连姓都是从百家姓的顺序“赵钱孙李、周吴郑王”随便取下来的。由于他深刻地挖掘了中国社会的病态，因此，“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由此可见阿Q性格所具巨大的社会意义。

《阿Q正传》早在二十年代就被译成俄文，以后又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传诵于世界。法国著名进步作家罗曼罗兰看了《阿Q正传》以后感动地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阿Q那付忧愁的面孔。”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亲自翻译了这部小说，并且给予了崇高的评价。阿Q这一不朽的典型，为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一颗绚烂夺目的明珠，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光辉的典范。

注：①引自《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

②引自《答〈戏〉周刊编者信》，《且介亭杂文集》。